



真情无悔

——一个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故事

李丽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真情无悔

—— 一个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故事

© 李 丽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情无悔/李丽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3-2890-9

I. 真…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011 号

真情无悔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李 丽 孔 菲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泰阳印刷制版厂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6.625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252599

前言

在我的德国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天夜里，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由于故事发生在德国而主人公是中国人，所以书中描绘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不同的风土人情、亲情友情，不同的爱情观和人生观、法规和制度等，都会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震撼，同时也为那些想出国闯荡的中国人展示了国外生活和社交的画面，给他们提供了某些经验和信息。

书中以一个癌症患者妻子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悲壮而凄美的抗癌故事。真实记录了在帮助和护理亲人共同与病魔抗争的漫长岁月里，患者亲属所承受的身心压力和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这对重病、久病患者的亲属们而言（他们是被忽视的、然而却非常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族群），会起到精神抚慰和心理辅导的作用，会帮助他们度过这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同时也写下了女儿的故事。女儿从十岁移居德国，从童年到少年直至青年，这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都处在特殊和艰难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离异、继父重病多年），却创下了奇迹：小学跳级，多次获柏林市武术大赛少年金、银、铜奖，一次绘画一等奖，十一年级在英国获全英中学生数学比赛银奖，省级英语讲演一等奖。精通德语、英语、法语、汉语四国语言。为人父母者若用

心从这个侧面去品味，这本书又堪称教育子女指南。

人最需要拥有的是健康、善良和爱，许多人忽视了它们，已经忘却了它们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伴侣。

现在，我的心里装满了生活中不寻常的故事，已盈满了各种情感，我选择了用文字来刻画出它们的轮廓和细节——为了自己不会忘记，也为了能给读它的人们许多帮助和感动。

人类思维中很美的一种，是思念。思念应该有一个寄托的方式，我写下这本书以寄托我的思念。

也许，您在读这本书时，会随着我的笔触共同去快乐去悲伤去憧憬；

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人生对爱情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感悟；

也许，您正处在困境和灵魂的低谷，这本书会带给您美好的感受、勇气和信心；

如果您已有了孩子，也许您会改变一些教育子女的观念和方法；

也许……

——那么，我就很欣慰了。

感谢我的家人们，感谢北京的两位气功大师，感谢我的男朋友、中国朋友和德国朋友们，是你们在我写此书过程中给了我鼓励、支持和理解。

我爱你们！！

李 丽

2005年2月于柏林

第一章

“血！血！”

我偶然扭头瞥了一眼与我并肩走着的德国丈夫，不由惊叫起来，我才开始学德语不久，还不能用德语迅速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只好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比划着。几秒钟后，他终于明白了，从口袋里掏出手巾纸，捂到鼻子上。我看到从他鼻子里流出的血是鲜红鲜红的，如同我身上穿着的红色细毛线针织连衣裙——这是新婚后作为新娘子的我，最酷最切合身份的着装色彩。

我们的婚礼是上个月举行的，从结识到相爱相许，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流鼻血。我想也许是刚从冬天寒冷的大街进入温暖的大楼前厅，冷热温差致使鼻子出血。可他一边用手巾纸捂着鼻子，一边自言自语道：“奇怪，从小到大从来没流过鼻血呀。”思索片刻他又说：“就连小时候同别的男孩子打架也没有流过，太奇怪了！”好在血很快就止住了。我突然觉得有什

么不祥之兆在远处窥视着我们，而这兆头与这鲜红的血有关。我于是对他说，我们应该去看医生。他想了想说，不需要。

也许我太大惊小怪了，出一次鼻血就去医生那儿，医生会认为我们太小题大做了。所以我也就不再作声了。

他是我的第二任丈夫。他的名字译成中文长极了：格哈德·海因利希·希尔福。希尔福是他的家庭名字，我们中国人称为“姓”；格哈德是他的前名，中国人称为“名”；海因利希是他的中间名，一般场合根本不用。这里的习惯是，朋友、好同事、亲属之间只直呼前名。官方场合、一般交往、办事都称姓，但要加上先生、女士、小姐之类的尊称。

格哈德有着典型的欧洲人形象：淡褐色的头发，留着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胡子，只是比他们的短一些。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随处可见悬挂着的马、恩、列、斯、毛画像。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大胡子印象颇深，并因此一直称他们为爷爷。到了德国，才知道按胡子划定人的辈分是大错特错的。这儿许多二十左右岁的小伙子也留胡子，并按个人喜好或脸型修刮成不同的式样。我同格哈德相识时他才四十二岁，那是我第一次应邀来德国办个人艺术展览，一个偶然的机使我们相识。第一眼看到他，就因为胡子差点把他也划为爷爷辈。当再离近细看和几分钟交谈之后，由于他白皙、无一丝皱纹细腻的皮肤，说话时有力迅速的手势和机敏的动作（使我想到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列宁），大而炯炯有神的双眸，才使我把“爷爷辈”的最初感觉更正到兄长辈。

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像我在著名风景区“九寨沟”看

到过的，那美丽清澈而神秘的“五彩湖”的色彩。更奇妙的是，在不同强度的阳光和灯光下，那眼睛的蓝色也会随之改变：晴空般的湛蓝、有宝石光感的孔雀蓝、夕阳下海水的深灰蓝……

我当时一个德语单词都没学过，靠着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英语，靠着手脚并用的比划，同格哈德交谈。这时我才痛切地感到，我的英语糟糕极了，虽然我在大学里英语课的成绩很好。怪谁呢？怪自己从没有过口语和听力练习机会？那时的教材还是沿用“文革”时的教材，记得我学了三本书下来，竟连最实际的生活常用单词都没学过，比如面包、糖、牛奶……而学过的尽是一些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工农兵之类的内容。我清楚地记得，中学时第一课学的不是最基本的二十六个字母，而是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第二课是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两堂课的内容至今我还倒背如流，可如今这两句英语说出来，对我丝毫无助，旁人只能认为我神经错乱。

格哈德是位有两个硕士学位的工程师。他完成了两门学业：一门是建筑的采暖、给排水设计专业，一门是教育学专业。这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说英语，所以我们最初的交流就靠了我戈壁滩般贫瘠的英语和他聪慧的理解力和罕见的耐心。

中国有句俗话叫“隔行如隔山”。由于职业的大不相同，本就犹如有座山横在我们之间，再加上语言障碍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大不相同，就使这看不见的山成倍的巨大和难以翻越。可事实上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忆起相识相爱

的美好时光，总是那么令我感动，感动得想流泪。

恋爱的过程总会是一个完美动人的浪漫小说，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向人们呈现着他们永远青春和美丽。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童话故事只写到相爱的两个主人公最终战胜邪恶和磨难，以盛大的婚礼庆典作为结尾（只有《海的女儿》例外）。是否有谁还想知道婚礼庆典以后的故事呢？那些以后的故事不会再浪漫如初，但一定会更长更真实，更生活化更人格化，却没有人会预知那将是人间的喜剧故事还是悲剧故事……

正因如此，我称这“婚礼庆典之后的故事”为爱情童话续篇。我这里想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续篇”故事。

不过，我还是想简要地告诉亲爱的读者，我在德国经历的爱情童话真的是很浪漫：格哈德第一次送我的淡黄色百合花（德语发音正好是“丽丽茵”，恰像我的名字丽丽）是我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束鲜花礼物（直到我出国时的一九九三年，中国北方的大城市里还根本没有鲜花店）；他陪我参观了柏林所有的大艺术博物馆；领我游览了全柏林的名胜古迹；去大教堂里听欧洲古典音乐会；在优雅的咖啡屋里品味纯正的咖啡、谈古论今；暮色中在有许多现代石雕的大公园里漫步。他帮我准备和参加了我为某大学及一些协会作的四场不同规模的幻灯艺术讲座和报告。他举止高雅幽默、健谈且联想丰富，对艺术尤其对音乐的感悟连我也自叹不如。那些美好的初恋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最灿烂的时光。那时的每一天，我们心中都充满了阳光。尤其是从十五岁就失去父母，至今一直未婚的格哈德，对家庭生活充满渴望，对未来充满幸福的憧憬。

是的，初冬刚刚举办的婚礼应该是他、确切地说，是我们通向幸福之路的起点。我们也如此深信无疑。

冬去春来，我们终于备齐了所有文件，我启程飞回中国去接女儿娜娜来德国定居。女儿那年刚好十岁。

格哈德非常兴奋，他很高兴我们的家中就要有一个孩子了。德国人的观念与中国人很不同，中国人一定是亲生骨肉才亲，血缘关系很重要。但许多德国人却不很看重这个，尤其是德国男人。正像格哈德对我无数次的说过，“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就肯定会爱她的孩子，无论孩子的父亲是谁。”

都说德国人排外，可在这点上却丝毫不排外。我也确实见过几个家庭，德国丈夫对妻子与前夫或婚前情人的孩子像对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就是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几年后，格哈德的老朋友海迪（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对我讲述了她的家庭故事，就更证实了我当初的感受：

海迪有一个长她八岁的姐姐，父亲对她的姐姐较偏爱，而且她们姐俩儿长得不相像。所以海迪从小就一直暗中猜测和嫉妒，她不是她父亲的亲生女儿。直到她父亲去世后数年，她的母亲病危，在弥留之际向她讲述了一直对她保守着的秘密：她和她的姐姐确实是异父同母姐妹，但与她猜测的恰恰相反，她的姐姐是她母亲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她是她父亲的亲生女儿。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部队开赴前苏联战场，一去再无音讯。战后在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的柏林街头，一位吹长笛的中年男人和他优美的笛声吸引了她的姐姐，当时她才六岁。她驻足侧耳倾听，然后跑到母亲身边，请求母亲给

她一点零钱。当笛声停止时她跑到那中年人面前，把钱递给他。吹笛人没有接她的钱，他对她说：“可爱的小姑娘，我不是卖艺，而是想让我的笛声带给我和更多的人一点欢乐。这世界上太多的战争和悲伤，我们需要一些欢乐……”走近来的母亲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她用被感动的泪水打湿了的双眼与这男子对视着……这对站在废墟之间、战争的幸存者因此相识相爱了。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海迪。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性格内向倔强的女儿是否能与这个陌生的蓝眼睛的新父亲友好相处。在孩子的心灵中，父母的离异无疑已形成伤害，尤其在中国的时候，我的生命信条是奋斗——成功，总是风风火火地干着我曾经认准的所谓事业，甚至挤不出足够的时间投入对女儿的关爱和与女儿的沟通交流。那时我的自我解脱理论是，我的奋斗会使我功成名就，收入颇丰，这些是对女儿的最好报偿。十年后，当我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对人生有了成熟的认识，我对女儿的童年有一种负债感。我想，如果有来世还让我做一回女人，我会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努力做一个十全十美的贤妻良母，精心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园。这对于人，尤其是对于女人，是生命中应享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话题一下子扯远了，还是回到这年的春天，我同女儿在柏林一起走出飞机场的那个晚上吧。

格哈德和他的朋友米西亚耶尔早已等在那里。简短的问候和行李装车完毕后，我们驱车驶向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家。

第一次面对两个都留着大胡子、讲着奇怪语言的陌生欧洲

男子，我的女儿小鸟依人般默不作声地一直紧靠着我，拉着我的手坐在车里。这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陌生的一切都突然在她眼前展现，她的内心一定感到恐惧。她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保护者当然只有我。

到家了。客厅的灯一打开，我和娜娜惊奇地看到：客厅中央的大圆桌上，摆满了一桌子色彩缤纷的糖果、玩具。最显眼的是簇拥其中心的一个坐着的、像大娃娃一样可爱的粉红色绒毛狗。娜娜站在为她准备的一大堆礼物前呆住了，片刻后，一下就把那个大绒毛狗紧紧抱在了怀里。

第二天，她给它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巧巧”。以后许多年她与巧巧床头枕边的形影不离，连日后学校班级外出旅游也要带上它，尽管巧巧要占去大半个旅行袋的空间。巧巧是女儿来德国后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在用语言根本无法与别的孩子交流的最初日子里唯一的朋友。巧巧给了她只有孩子之间才会感受到和渴望到的童真友情，使她在陌生而全新的环境中少了一些孤独感多了一些童趣和温馨。

那晚，我也被这满桌的礼物深深感动。感谢格哈德精心为女儿揭开了这美丽的新家的序幕，营造了展现在女儿眼前第一瞬间的美好氛围。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娜娜看格哈德的眼神里没有了戒备，多了许多亲切。我的心也放宽了许多。我肯定，在格哈德和娜娜之间已经有了互相沟通的良好开端。

以后几个月的情况也证实了我的预感，他们父女二人相处得很好。格哈德特意买来看图识字形式的儿童德语书，从ABCD的最初字母开始教起。感谢上帝，娜娜有着天生的语言

天赋，她的发音极准确清晰，就像她幼儿时刚刚开始吐字说话，从没有过含糊不清的发音现象，每个音她都咬得准极了。现在这成了她学德语的优势。一个月后，格哈德就领她去小学报到入学了。她插班在四年级。

转眼夏天就要过去了，这期间我也没闲着，办下来了艺术家身份证明和独立经营艺术作品的许可（按中国的话讲，这叫艺术专业个体户）。又与几个艺术家代理社建立了业务关系，同时学德语、画画、联系筹办画展等。当然这与在中国的忙相比，轻松得如住疗养院。总之，生活犹如沐浴在夏日的灿烂阳光中，仿佛一切应该就是这样美好，而这美好就是应该这样持续下去。

我在童年时赶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少年时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全家从大城市迁往生活条件艰苦的小镇。从镇中学毕业后随上山下乡洪流又被迫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家，到生活极端贫困艰苦的山乡“接受再教育”，刚刚进入青春期，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无耐地在动荡和不安中蹉跎。幸运的是一九七七年，十年动乱结束，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才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鲁迅美术学院，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四年寒窗苦读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出国前做到了副教授和系副主任的职位。当时还与几个电视台合作，主持了许多艺术讲座和专题节目。那时所有的寒暑假都用来工作，周末也难得休息，总是无休无止地学习、工作、再工作，生活的旋律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却少了休止符号。

现在，这美好平静的生活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我这已经经历了许多动荡、艰苦、奋斗、坎坷人生的女人，我渴望过恬静安稳的家庭生活，营造一个温暖的巢，在这巢中做我想做的事，享受人生。

没有人知道，在这平安顺畅的生活旋律中，我却渐渐听出了低音部的杂音，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这起因就是格哈德的鼻血。

自年初第一次流鼻血后一个多月，又流了第二次。第三次与第二次间隔也大约一个多月。再以后不到一个月或两周就出现一次这种情况。鼻血流出的不多，几分钟后会止住，颜色总是鲜红的。流鼻血前一点先兆和原因都没有，有时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血就悄悄地流出来了。我心里暗自害怕：可不会是癌吧？这种可怕的潜意识随着每次鼻血的出现，就闪现在我的脑中。我没有对格哈德和任何人讲我的担心。我总是催促格哈德快去看大夫，而他总是拒绝。在德国，个人意愿是绝对被尊重的，就是作为妻子，我也不能强加于他，不能强迫他去看医生。

盛夏，我们全家去参加中国女朋友冯奇境的生日聚会，我对她讲了我的忧虑。奇境是位工科博士，丈夫也是德国人，是一位物理博士。奇境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与我相似，她比我年长几岁，来德国也比我早几年，乐观开朗坚强勤奋。有事我总是喜欢与她讲，听听她的建议。往往从她那儿我会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学到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经验。

奇境劝我不要太神经过敏，出鼻血也许是体内火大，可以给格哈德熬绿豆汤喝。对呀，绿豆汤可以去火，这对中国人来

说是生活常识，我真笨！怎么早没想到。第二天我跑到亚洲店买回一袋绿豆，立即熬了一锅汤。

格哈德半信半疑。也难怪，中医理论西方人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生了病就是用各种仪器诊断，吃药片、打针、动手术。所以格哈德怎么也弄不懂，我为什么说他“火大”。他无法想象，他的身体内会有火。由于这个缘故，他汤喝得很勉强，总借口说味道太差争取少喝，我就给他多加了些糖，但也喝得不多。到又一次鼻血流出，他就坚决不再喝绿豆汤了。

转眼到了秋天，流鼻血的次数明显增多，每两周甚至一周就流一次。我不再让步，拉着他的胳膊同他一起去了离家最近的一个耳鼻喉医生诊所。

在德国看病，都是去私人诊所。每人还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内科医生做保健医，可以定期去做体验。这种保健医生的称呼直译成中文叫“家庭医生”。如果经诊所医生诊断要进行复杂的治疗或手术，才写转诊单去医院住院。只有紧急情况下病人才直接去医院。所以医院里只设有急诊部和占比例很小的门诊部。医院的主要职能是施行手术和接受住院治疗。

在这个耳鼻喉诊所里，给格哈德看病的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女医生，她写了个转诊单，让我们去另一个专门做透视、拍X光片检查的诊所做拍片检查。两天后我们取了片子再回到她那儿。女医生看了片子后说，格哈德的鼻腔里（医学用语称“上颌窦”）长了息肉，先服三周药看看，也许会自行消退。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我虽没学过医，但我觉得用药就消除息肉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对格哈德说，我们应该再去另一个诊所

再看一个医生。他却不采纳我的建议。

回家后，格哈德百分之百地遵照医嘱行事，老老实实吃了三周药。三周后，我们又到那女医生处做检查，结果是息肉没有消退。于是女医生又建议做一种物理治疗，我说不出它的中文名字，但我看就像中国的理疗“烤电”，用个灯照着鼻子，那灯连着一个大箱子般的仪器。

一周过后，仍不见一点效果，鼻血照流。那女医生这才说，应该去医院做手术割除。她给格哈德开了入院转诊单。

我们被介绍去的是一家教会医院。这个医院的耳鼻喉科据说在柏林享有很好的声誉。正因如此，当我们拿着转诊单去医院做手术预约时，女秘书一家伙就把预约时间写到了明年的五月份。这可吓了我一大跳，还以为我过糊涂弄错了日子。因为明年的五月距眼下的十月至少要有七个月的等待！格哈德与那女秘书交涉了好久，请她尽量想办法把日子提前些。我看那女秘书在那写满预约的专用大日历册上翻来覆去地查找了半天，才在明年三月份见缝插针地为格哈德订了预约。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一直主张，既然这家医院床位这么紧张要等这么久，为什么不换个医院尽快做手术呢？德国人有时就是“一根筋”，做事认准了点儿，不会变通。格哈德说，这家医院的耳鼻喉科是柏林最好的，等五个月值得。我心里想，要是这五个月癌变了呢？但我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这种话一直没对他说出口。就是以后的五个月中，也从未提过癌这个可怕的字眼儿。

八年半后，我才从一个年轻的德国医生口中听说，长在鼻

子里的息肉不会癌变，而长在腹腔中任何器官上的息肉才有癌变的可能。至此，再回忆起当年格哈德肯等那么久的手术预约，肯定是那个女大夫给他讲了这个情况，所以他才那么坦然地去等待这漫长的五个月。

“预约”，德语发音叫“特命”。它在这里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办事一板一眼极有条理和计划的德国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事先做个“特命”。如看牙医，特命有时会排到两三周以后，特命的时间会写明几点几分，而不是一个大约的时间范围，很精确的。朋友互访或周末节假日相聚，也要提前定好特命，有时甚至提前几周或个把月就订好。人人都有个日历专门记录大大小小的特命，到时候准时无误赴约。而订好的特命，没有极特殊情况是不更改的，可谓雷打不动。绝不会像中国人的约会方式，前两分钟打电话说，你有时间吗？咱们聚聚好吗？两分钟后双方就坐在饭店里了。一个手术特命等待时间如此之长，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生活像小溪一样随着光阴流淌着。可我的内心却渐渐感受不到了那条溪流的欢畅，因为在国内的母亲也患病了。

母亲患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她的肾在几个月内全部衰竭了。这种病叫肾坏死，也叫尿毒症。肾是通过尿液为人体排出毒素的器官，它坏死了不再工作，人很快就会因血液中有毒物质积累太多而中毒死亡。这是一种像癌一样可怕的疾病，与癌症不同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肾衰患者有了继续延长生命的办法：血液透析或换肾。

透析是在病人的动脉中插入导管，抽出血液，同时让血液